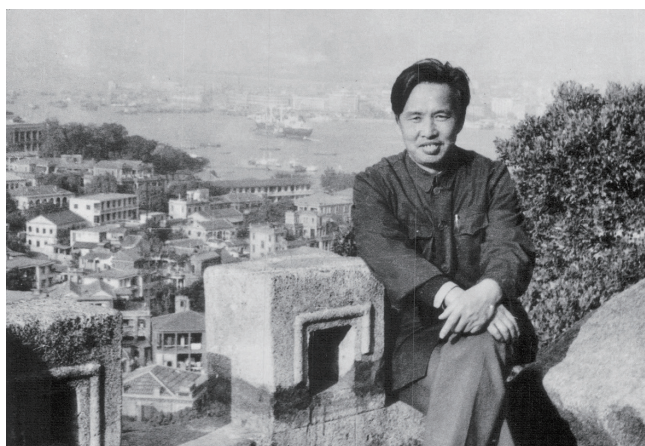


科学人生

天地位焉 万物育焉——怀念我们的老师翟中和院士

佟向军 陈建国 张传茂 丁明孝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北京 100871)



翟中和院士

翟中和院士(1930—2023年)是我国著名的细胞生物学家,也是我国生物电子显微学的奠基人之一。翟老师出生在中国江南农村的一个普通的小农之家,历经坎坷,凭借自己不屈不挠的努力,持之以恒的勤勉,终成大家。他的经历,催人奋进。

风雨故园

1930年8月18日,翟中和出生在江苏省溧阳县,与宜兴交界的一个小村庄——八字桥。上世纪30年代,连绵不息的社会动荡下,溧阳也难以逃脱当时中国农村普遍的凋敝情形。8岁的时候母亲因病去世,翟老师从小就体会了生活的艰辛。

翟老师7岁开始在村里唯一的学堂接受启蒙教育,学堂是一至三年级的几十个孩子的共用教室。教师也只有一位,负责轮流讲授三个年级所有的课程。特殊的环境,使他从小就养成了自学和独立思考的习惯,这对翟老师今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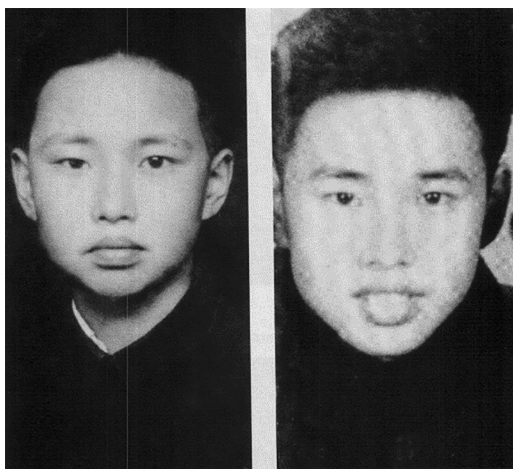
不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南京相继失陷。日本侵略军不时下乡扫荡,兵荒马乱,乡村的宁静不复存在。翟老师与他的小伙伴们不得不经常停课,随大人东躲西藏。这种情形下,能保住性命都已不

易,要安放一张书桌就更是成了奢侈,翟老师也越发珍惜学习的时间。战乱使乡下更加破败,翟老师家中的情况日渐困窘,每天早晨聊以果腹的食物一般只能是一碗稀粥。学校离得远,路又难走,翟老师很早就要出发去上学。深秋时节,蒙蒙细雨不断,对仅以稀饭果腹的少年而言,走到半路,便已饥寒交迫。八字桥到歌岐村只有羊肠土路,翟老师经常赤脚在雨中踩着冰冷泥泞的路,走6里路去学校,从未旷课。到了学校,在不御风寒的教室里空着肚子听课,中午也没有午饭,下午还要继续上课。少年不识愁滋味,年幼的翟老师并没有觉得生活的艰辛,而是记住了很多乐趣,童年的水乡生活带给他许多甜美的回忆。

抗日战争胜利后,翟老师考入了江苏省立溧阳中学。当时的生活十分清贫,但教师们的教学态度都十分认真,有一份中国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担当,



翟中和与少时好友李栋生



初中毕业(左)和高中时(右)的翟中和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种情怀也深深影响了翟老师，当他自己成为教师后，对学生始终有份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转眼高中毕业，并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翟老师开始认真考虑自己的前途。翟老师出生和生长在农村，从小的耳濡目染，将来当一位医生或者农业科技人员，成为翟老师的最终选择。1950年，翟老师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

留学岁月

从江南乡村走出来的翟老师，坎坷的经历和艰难困顿，赋予了他强大的自学、自律能力，磨炼出了他承受任何困难的强大心理素质和毅力，面对任何艰苦、恶劣、凶险的环境，他都能安之若素，珍惜学习与工作的机会，始终把做事放在首位。他在以后70多年的人生中，从来不会怨天尤人，从不因怀才不遇而自怨自艾，无论遭遇任何挫折，他都依然满怀希望，努力向前。少年时的艰苦经历，也使他多了一份

对劳苦大众的理解，多了一份对农村出身学生的关怀与重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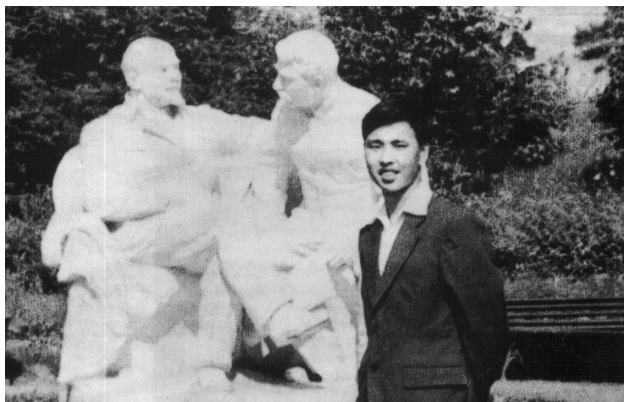
清华园是一个农村少年心中的知识圣殿，悉心向往。“我第一次看到了实验室和图书馆，第一次看到了显微镜，第一次使用了自来水和电灯……”更令他激动的事情还远不止这些，翟老师在这里见到了久有耳闻的大学问家。陈桢、赵以炳和沈同等教授开设的“普通生物学”，李继侗教授的“植物学”以及张青莲教授的“普通化学”课程，都让这位来自农村、曾经赤脚踏着泥泞求学的学子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大师们将深奥晦涩的知识娓娓道来，深入浅出，引人入胜，翟中和第一次意识到科学原来这样有趣，这样令人着迷。从那时起，翟老师的心中隐隐约约有了一个人生目标，一个懵懵懂懂的少年，开始为自己的目标奋斗了。

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而人才是建设国家的第一要务。1951年，中国派出留苏学生375名，翟老师就是这其中的一员。呼啸的列车，穿过广袤的西伯利亚平原，运行了7天7夜，终于到达终点站莫斯科。留学生们在这里被分配到不同的大学学习，翟老师被派往列宁格勒(现圣彼得堡)大学生物学系学习。

列宁格勒的冬天漫长而阴沉，与翟老师的家乡溧阳天差地别，与清华园所在的北京也大相径庭，但这一切都没有影响翟老师的学习。由于没有语言基础，刚开始上课时连笔记都记不下来，只能在课后向苏联的同学借笔记来抄。翟老师他们要同时学



伏罗希洛夫(一排右2)到北大访问，参观汤佩松先生实验室，翟中和(一排左3)做翻译(一排左1为陈德明先生，左2为陈阅增先生，一排右1为汤佩松先生；二排左1为当时的北京市长彭真，左3为当时的北大校长马寅初先生)



在列宁格勒郊区(1954年)



1955年, 翟中和(右1)与沙萨·尤金、莫加·依沙伊凡一起做实验



留苏归国时的翟中和与弟弟翟中齐在天安门广场

习专业课和俄语, 因此要比苏联同学多花一倍的时间。每天除了吃饭和睡觉, 就是学习, 时间多达16小时。“我的想法也很单纯: 到了苏联一切都为了保证学业, 其他的什么都不想。”心中只想把知识学到手, 回去建设新中国。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翟老师的成绩单上, 45门课中有44门考了5分。他的俄语也是突



北京大学1958级放射班毕业合影(前排右2为翟中和, 前排左6为沈同, 中排右7为高伟良, 高伟良后来和翟中和一起工作)

飞猛进,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于1957年时到北大访问, 翟老师给他当翻译, 这位苏联领导人赞许道: “你的口音很纯正!”

1956年, 26岁的翟老师于列宁格勒大学毕业, 并获得优秀毕业生荣誉。回国后适逢全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 北京大学动物学和植物学系、清华大学生物学系以及燕京大学生物学系合并, 成立北京大学生物学系。翟老师服从组织安排, 到北京大学生物学系工作, 先后担任李汝祺教授和沈同教授的助教。

1959年, 翟老师再次被派往苏联进修, 这次是到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主攻生物电子显微学, 在导师弗兰克院士和别里科夫斯卡娅通讯院士的指导下研究射线对细胞超微结构的影响。别里科夫斯卡娅当时已年逾六旬, 但依然精力过人、严谨勤奋, 她的悉心指导和言传身教, 对翟老师的学术研究和人格塑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后的数十年里, 翟老师应用电子显微技术在细胞生物学领域做了大量系统而有特色的工作, 成为我国生物电子显微学的开拓者之一。1991年, 翟老师在时隔30年后才有机会重访莫斯科, 斯人已逝, 他特意到别里科夫斯卡娅的墓碑前凭吊, 感念这位对他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导师。

艰难岁月

1961年回国后, 在政治气候和物质条件都异常严苛的情况下, 翟老师与其合作者攻坚克难, 筚路蓝缕, 在国内建立了细胞超微结构研究技术。该项技术当时主要用于放射生物学研究。

十年内乱期间, 北大、清华的许多教师被下放

到江西省鄱阳湖畔的鲤鱼洲,建立北大鲤鱼洲分校和实验农场。

翟老师全家四口住在四面环水的一个小岛上,说是住房,其实就是由牛圈改造的小草房。后来杨澄老师(翟老师夫人)被抽调到军宣队,夫妻两人两地分居,两个女儿都要翟老师来照看。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翟老师对待自己在干校里的“工作”——养猪和种水稻仍然一丝不苟。他对任何事情都认真负责,这是他的一贯作风。他的猪每头都养得膘肥体壮;他们种的水稻也年年丰产,他领导的班被称为“水稻丰产班”。因为这些突出表现,翟老师在1970年被评选为江西省劳动先进分子,作为走“五·七”道路的优秀代表,到井冈山参加了先进分子表彰交流会。

1971年7月,北大校党委决定撤销鲤鱼洲北大实验农场,老师们返回北大。

1970年前后,北大生物学系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翟老师知道学员们的知识底子太薄,但他很看重他们的勤奋苦学精神,就从最基础的概念讲起,反复讲。在教书和共同劳动的过程中,翟老师和这些学生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感情。后来,这些“工农兵学员”有的成为翟老师的研究生,有的出国留学,不少人走上了企业的领导岗位,还有人当了教授和院士。

1973年,北大生物学系已经开始逐步恢复日常教学和科研工作,系里把生物楼124室分给翟老师做实验教学用。老师们清理了124室的垃圾,重新安上了缺失很久的门,自己动手修理、调试仪器设备,因陋就简,满足基本的教学需要。从此,124室成为翟老师团队最主要的实验室,直到现在,翟老师的学生们,都认定自己是“124”人。

疫苗研究

凭着对科研的热情和执着,翟老师与其他几位老师,组建了畜牧兽医专业,招收工农兵学员。北大老师传统上是做基础研究的,对兽医和相关家畜疾病和免疫接种可以说一点都不懂,但经过艰辛的努力,翟老师所带领的团队不但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病毒鉴定方法,并鉴定出了猪传染性水泡病、牛流行热、牛传染性鼻气管炎、口蹄疫等家畜传染病的病原体;同时也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疫苗生产技术。当时,一般是用小动物或鸡胚来培养病毒疫苗,操作

复杂,产品质量不稳定。“是否可以用培养细胞来繁殖病毒,做疫苗,进而推广到生产上去”。只要确定了方向,无论多么辛苦,无论多么困难,翟老师都会把工作向前推。基础研究出身的他,从没见过疫苗的工业化生产,于是就带学生下工厂调研,无论路途远近,他都亲自率队。

翟老师团队用单层成纤维细胞培养鸭瘟病毒,经连续传代,使病毒对鸭的致病力显著减弱,制成鸭瘟弱毒疫苗。这个工作,开创了中国细胞鸭瘟疫苗的先河。

翟老师率先在国内研究用培养细胞制备疫苗的技术,并先后多次在国内生物制品厂举办组织培养细胞繁殖病毒的学习班,培养了一批掌握细胞培养技术的骨干力量,并于1976年在全国兽医行业里招收了一批学员进入北大生物学系学习,创办了兽医生物学专业。他们于1980年毕业后,都在各自岗位成为骨干,有的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细胞疫苗安全可靠,疫苗免疫力稳定,持续时间长,节省了人力、物力和财力。这在那个特殊的历史阶段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在从事应用研究的同时,翟老师还对病毒与细胞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索。他利用电子显微镜技术并结合其他手段,对家畜和人的多种病原体病毒在细胞内的复制、装配及其与亚细胞结构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研究,发表了60多篇论文。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研究的进行,一个以翟老师为核心的团结、勤奋、有特色、有活力、有创造性的科研集体逐渐形成,这也是后来细胞生物学的雏形。



兽医生物专业的学生(后排左3为翟中和,后排左5丁明孝,后排右1为蔡益鹏,中排右1为马莱龄,前排左3为刘素珍)



参加翟中和在郑州举办的细胞培养培训班的学员合影
(最右侧穿军大衣站立者为翟中和)



北京大学“文革”后首届毕业生合影
(中排左1为于豪健, 左3为翟中和, 左4为陈阅增, 左5为高伟良, 左6为潘惟钧, 左7为马莱龄, 左8为李荫蓁, 左9为丁明孝, 左10为刘素珍。这些教师是细胞生物学专业建立之初的主要力量)

细胞生物学学科的建立

1976年10月, 随着“四人帮”的倒台, 中国的知识分子迎来了科学的春天。

翟老师青年时代的梦想, 探寻细胞的奥秘, 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他敏锐地察觉到, 对细胞的结构与功能、增殖规律的研究, 将是生命科学领域的重要方向。翟老师学术思想的这种转化, 早在他用细胞培养疫苗的时候就已萌芽。

1978年北大建立细胞生物学专业, 翟老师为学科带头人。也正是这一年, 国家恢复研究生教学, 并实行学位制度。翟老师招收的首批硕士生何大澄和丁明孝, 就是这1万多名幸运者中的两个。

何大澄和丁明孝都是北大生物学系60年代的

大学生, 翟老师第二次留苏回来的时候, 做过他们的班主任。知道考研恢复的时候, 翟老师立即给何大澄打电话, 让他必须回去读研究生。翟老师对他说: “你在那儿当搬运工和下农田, 这不是你亏了, 这是国家亏了, 白培养你了。”

翟老师对学生的前途非常关心, 对学生的要求也很严格。何大澄和丁明孝刚入学的时候, 翟老师就提出来三条要求。他说, 我们好不容易有机会做一点事情, 给你们提几点要求。“第一点, 你们不要在夜里12点钟以前睡觉; 第二点, 星期天和节假日就不要休息了; 第三点, 这几年就别生孩子了。”这些要求今天看来似乎不近人情, 但当时的科学工作者好不容易有了做点工作的机会, 所以人人都有一种紧迫感。

翟老师是一个事必躬亲的人, 每次学生看电镜, 他也亲自前往, 电镜照片翟老师都要亲自看, 边看边给学生讲, 他对工作简直是痴迷。细胞里的细微结构, 是学生们在电子显微镜下看到的, 但是真正认识它们, 都是翟老师亲自引导的。学生们至今都对此印象深刻, 也受益匪浅。

作为导师, 他不是告诉学生一个题目, 让学生先去试, 而是他自己先试, 并且手把手教学生。他对学生的工作进展一直十分关注。我们都知道, 跟翟老师汇报结果, 不是你一说, 他听完了, 问问情况就可以了。往往他会跟你说, “你做一遍给我看, 你的结果怎么做出来的。”即使他当时很忙, 也仍然记得这些事, 他会和学生说自己什么时间有空, 约定来看学生的实验操作。他对待科学极其严谨, 这种精神也深深影响了他的学生们。

老生物楼310室, 一间只有18平方米的小房间, 就是翟老师完成了很多重要实验的地方。那里有一个无菌间, 至少占了六七平方米, 是翟老师他们的细胞培养间。剩下的12平方米, 是四位老师的办公室和制备电镜样品的地方。翟老师的办公室常常是晚上最晚熄灯的, 所以他又被戏称为“生物学系的最后一盏灯”。

翟老师多年来一直坚持“勤能补拙”的信条, 他说: “我谈不上有什么成就, 论聪明和能力远比不上那些有成就的科学家。唯一可以谈的一点经验, 就是几十年来我每天比一般人多工作两小时, 星期天与节假日一直坚持工作。”翟老师认为, 做一个科学家固然要有天赋、要有才能, 但即使这样还是需要

坚持、勤奋,只争朝夕。

负籍西行

翟老师在与学生辛勤工作于实验台的同时,也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国际上细胞生物学的研究动态。上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工作的不断深入,翟老师深刻意识到仅仅局限于超微结构形态学已经落后于形势发展,细胞生物学的研究已经不再局限于形态学的描述,必须深入到分子水平,探索生物机制。1985年至1986年,已经是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的翟老师,在年届55岁时第三次负籍西行,到分子生物学发端的地方——美国,去取经,去学习。留学的目的地,是美国著名的常春藤名校——麻省理工学院。1985年5月起,翟老师在MIT生物学系佩曼(Sheldon PENMAN)教授的实验室做访问教授,研究细胞核骨架及其与基因表达的关系。

翟老师亲身感受到与美国同行的显著差距,格外珍惜这次学习的机会,争分夺秒地工作。超负荷的工作,使他患上了坐骨神经炎,这种病伴有剧烈而持续的疼痛,他甚至无法站立。但他的实验也一直未停,不能久站,翟老师就在实验室的椅子上躺着,定时起来看一下实验,再接着躺一会儿。

拖着疾病缠身的躯体,忍受着高强度的实验工作,翟老师在美国的一年半时间里发表了3篇论文^[1-3]。他在这里学到了细胞分子生物学技术,接触到了关于细胞骨架的研究领域,这也成为了他以后学术生涯中最主要的研究方向。

翟老师的学术生涯中,经历了几次研究方向的转变,从开始的遗传学,到第二次留苏时的超微结构形态学,从兽医学的疫苗制备,到细胞生物学的基础



杨老师和翟老师在美国

研究,从细胞形态学到分子生物学,每个方向上他都做得风生水起。别人的眼里,翟老师一定是聪明异于常人,而只有他自己,他的家人、同事、学生知道,每次转变之中蕴含的艰辛。“我并不聪明,我最大的优势就是勤奋。我相信勤能补拙。”古人云:“旦旦而学之,久而不怠焉,迄乎成。”

吐哺握发

在做好自己科研工作的同时,翟老师把大量的心血投入到学科发展上。他始终关注着北京大学细胞生物学学科的发展和建设。从北大生物系建立细胞生物学专业开始,他始终是本学科发展的核心人物。“一个人的社会责任感体现在方方面面,翟老师做学问、带动学科发展是他的责任感”,翟老师的学生、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前院长丁明孝这样说。北京大学细胞生物学专业在翟老师的擘画和带领下,从1978年建立学科、旋即开设细胞生物学课程,到建立博士点、成立细胞生物学研究所,再到入选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已成为中国高校中实力最强的细胞生物学学科之一。

青年人才的不断涌现,是学科发展的基础和后劲,翟老师一直很重视对人才的培养和引进。他常常教导已经做了教授,甚至已经身为领导的自己的弟子,提醒他们给年轻人更多的发展机会,多关注年轻人的成长,对处于发展期的教师多些耐心、多些支持和建议,多些鼓励和帮助,让他们尽快成长起来。翟老师自己一直以来也是这么做的,这恰恰是北大的细胞生物学学科能够建立、发展并逐渐变强的根本。

翟老师的人才观是大视野的,是开放的,为科



翟老师在MIT生物学系佩曼实验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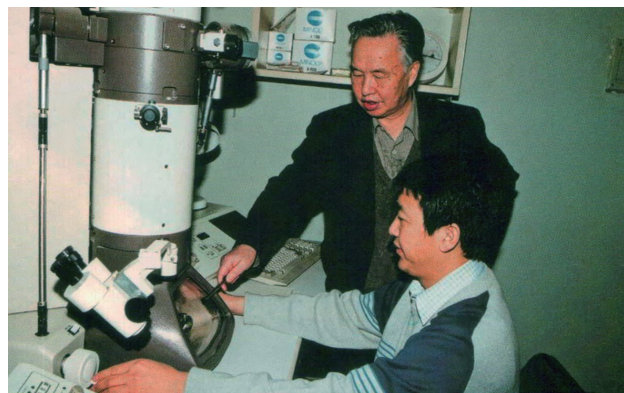
丁明孝(前排右1)和翟中和(前排右2)在一起

学培育人才。他时刻为学生的前途着想,为学生的成才铺路,而不仅仅局限于“人才为我所用”。他坚信,细胞生物学的发展,在于人才,人才要成长,就要学习最先进的知识和技术,学习最现代化的科学理念。困住年轻人,让他们待在自己身边,无异于故步自封,抱残守缺,是没有前途的。虽然那时北大的细胞生物学专业正是需要人的时候,但翟老师为学生更好的发展前途考虑,支持和推荐学生到兄弟单位、到国外大学去读书、留学、深造。

他对学生们的关怀,除了在工作上,还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翟老师对学生的关心是全方位的,学生父母的健康、家庭的关系、家里的环境,包括谁在交男朋友、女朋友……一切都很关心。翟老师是个能凝聚人心的人,他留住大家不是靠强制力,而是靠“感情投资”。翟老师的学生张传茂教授说:“我们没有和翟老师谈过自己的待遇如何,他一说让我们回来,我们就回来了,就这样。”

翟老师的人才观是开放的,包容的,全局性的。他从不任人唯亲,反对“近亲繁殖”。对他自己的学生以外的人,他也都热心扶植。1998年,国家“973”项目“细胞重大生命活动的基础与应用研究”组织立项,作为组织者,翟老师没有将它据为己有,而是把国内在细胞生物学方面有所成就的专家集合到一起,不但集中了很多成名的科学家,更包括了当时发展势头非常好的一批年轻科学家,他们之中后来成为了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就有5人。

“与先生的合作,让我收获很多,也是我人生中一段宝贵的经历。”中国科学院院士舒红兵回忆起往事,仍然满怀感激之情。“与先生相处的五年中,那些大大小小的事,至今仍令我念念不忘。先生



翟老师指导张传茂看电镜

热爱科学,工作勤奋,对学科发展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先生的爱才惜才不仅限于他的学生,他称赞、欣赏并提携了当时国内生命科学领域的一批优秀中青年学者,他们中许多人都已经成为今天我国生命科学研究或管理方面的栋梁。崇尚学术、爱惜人才、提携后辈,是先生作为我国细胞生物学领域一代大师的可贵品质。”这就是舒红兵教授对翟老师的评价。

翟老师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后,连续多年担任北大生命科学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是生科院一代年轻人成长过程中的指路人和良师益友。

翟老在建设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细胞生物学学科的同时,也关心着整个中国细胞生物学的发展。他无私地奉献出自己的精力和时间,扶植其他学校细胞生物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才的培养。1996年翟老师帮助清华大学生物学系建立细胞生物学学科,从建设电镜室,到带领有教学经验的老师,在清华大学讲授“细胞生物学”课,再到帮助引进人才,不遗余力。

翟老师还曾帮助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和四川大学等院校细胞生物学课教学,支持他们的学科发展。

传世教材

上世纪80年代以后,细胞生物学发展非常迅速,尤其在分子生物学技术的推动下,细胞生物学从以超微结构为主体的基本内容,迅速融入了分子机制的研究,重大进展层出不穷,学科的内容日新月异。教科书也应与时俱进,不断更新知识系统。在这种情况下,翟老师组织起国内最优秀的一批专家,编写

了《细胞生物学》^[4]教科书。这本书现在已出版到第五版,成为国内广为使用的生物学教科书之一。

翟老师对教学特别重视也特别认真,这种“认真”是超乎寻常的。他认为,做一个好的老师一定要把课讲好,在讲课的过程中,把自己的经验体会不断地总结、提炼,最终汇成一本教材。他强调教师一定要做研究,只有做研究以后才知道这个领域里发生了什么,否则课也不能教好。

细胞生物学专业刚刚成立之后,细胞生物学课主要由翟老师讲授,他备课的地点就是当时他的实验室——老生物楼310室房间,那间使用面积仅约12平方米的房间。翟老师的讲稿,很厚一沓,没有电脑打字,都是手写,一笔一画,非常认真。翟老师讲课,语速不快,言简意赅,条理清晰。随着学科的发展,翟老师的讲稿也在不断地修改、完善。每次讲课前,他都很认真地思索,从头到尾课该怎么讲,想了很多。这是翟老师的一贯风格,做事情认真、执著,要求尽善尽美。

把教学工作做好,经过十几年的教学实践,最终把教学经验积累起来,写一本教科书,这是翟老师的一个理想,也是他的教学理念。翟老师对教材的要求很高,教材不是随便抄来抄去,不是“剪刀加浆糊”的游戏,要写,就要写出能影响几代人的教材,这是他的一个夙愿。

上世纪80年代,翟老师总结了多年的教学经验,以自己不断修改、完善的讲稿为蓝本,开始动手写教材了。那时家里住房面积小,没有像样的书桌,翟老师索性把讲义和参考资料都铺在床上,每天在床上趴着写。最早那本16.1万字、32开本的《细胞生物学基础》^[5]就是这样写出来的,它也是日后在全国影响巨大的《细胞生物学》^[4]教科书的前身。

1991年,国家教委(现教育部)首届理科生物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及教材建设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呼和浩特市内蒙古大学召开会议决定出版42种教材,这是高等教育出版社“八五”建设规划,《细胞生物学》是重中之重。

1992年开始,以翟老师为领衔人,组织了很多高校的教授开始编写《细胞生物学》,中国当时相关领域的专家,几乎都被邀请到一起。翟老师在这本教材上花了很多心思,因为这本书并不是翻译,而是自

主编写。1995年10月,《细胞生物学》第一版终于付梓。

《细胞生物学》出版后,很多院校把它作为本科生教材,研究生入学考试的指定参考书。这本书先后获得了国家教委教材的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全国首届优秀教材一等奖。如今,《细胞生物学》已经再版了5次^[4,6-9]。要做就做精品,精益求精是翟老师的一贯风格,也是所有编者的共识。更加难能可贵的是,翟老师从来没有把这本书看成是自己一个人的财产,虽然他是领衔人和主编。翟老师的唯一希望,是这本书能越写越好,能把它传下去,名和利不在他的考虑范围。《细胞生物学》要组织修订第二版^[6]的时候,他就把已经成长起来,并且富有教学和研究经验的一批中青年学者安排进来负责某些章节,而年事已高的老先生则逐渐淡出。到第四版^[8]修订完成的时候,翟老师坚持在第五版^[9]中一定要把他的名字拿下来,让别人做主编。他希望把这本书越做越好,考虑的是这本书能往前发展,后继有人。

如今,翟老师虽然离开我们了,但他扶持的年轻人已经成长起来,已经有一个完整的梯队续写这本《细胞生物学》,也将续写北大细胞生物学学科的辉煌。写一本能够影响几代学子的教科书,翟老师实现了他的夙愿。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声岂浪垂。”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ZHAI Z H, NICKERSON J A, KROCHMALNIC G, et al. Alteration in nuclear matrix structural after adenovirus infection [J]. J Virol 1987, 61(4): 1007-18.
- [2] ZHAI Z H, KROCHMALNIC G, PENMAN S. The association of vaccinia virus with intermediate filament [J]. Sci Sin B, 1988, 31: 28-38.
- [3] ZHAI Z H, CHEN F, NICKERSON J A, et al. Association of adenovirus DNA transcribed activity with nuclear matrix of host cells [J]. Sci China B, 1989, 32(2): 176-85.
- [4] 翟中和. 细胞生物学[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5.
- [5] 翟中和. 细胞生物学基础[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 [6] 翟中和, 王喜忠, 丁明孝. 细胞生物学, 第2版[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 [7] 翟中和, 王喜忠, 丁明孝. 细胞生物学, 第3版[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 [8] 翟中和, 王喜忠, 丁明孝. 细胞生物学, 第4版[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 [9] 丁明孝, 王喜忠, 张传茂, 等. 细胞生物学, 第5版[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0.